

江户时期百科全书中中华广东形象的重构 ——以《和汉三才图会》中华地理·广东为中心

杨亚丽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

DOI:10.61369/HASS.2025030022

摘要：《和汉三才图会》是江户时期寺岛良安编纂的大型百科全书，中华地理部分对广东的记载呈现出与《三才图会》显著不同的编纂特色。本文通过文本对读与文献溯源的方法，重点考察广东条目的出典来源与编纂手法，揭示寺岛良安在参考《登坛必究》《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等文献基础上，如何对地理数据进行本土化处理，并将人物事迹与物产信息综合融入叙事结构中。研究表明，《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并非简单抄录，而是经过选择、整合与转译的知识再生产，反映出江户时期日本知识界在接受中国地理知识时所展现的主动性与本土适应性。

关键词：和汉三才图会；广东地理；知识转译；中日文献交流；百科全书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Guangdong in China in the Encyclopedia During the Edo Period — Focusing on the Chinese Geography of Guangdong in "Wakan Sansai Zue"

Yang Yali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

Abstract： Wakan Sansai Zue is a large-scale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Terashima Ryōan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e section on Chinese geography, particularly the entries related to Guangdong, exhibits distinctive editorial features that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its primary model, Sancai Tuhui. This study employs textual comparison and source tracing methods to examine the origins and compilation techniques of the Guangdong entries. It reveals that Terashima Ryōan, while referencing works such as Dengtan Biqu, Huayi Tongshang Kao, and Zengbu Huayi Tongshang Kao, localized geographical data and integrated biographical narratives and descriptions of regional products into a comprehensiv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Guangdong section of Wakan Sansai Zue is not a mere reproduction of Chinese sources but represents a process of selective adaptation,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recontextualization. This process reflects the active agency and local adaptation exhibited by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Edo period when engaging with Chines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Keywords： "Wakan Sansai Zue"; Guangdong geography; knowledge translation; Sino-Japanese textual exchange; encyclopedia compilation

引言

《和汉三才图会》是日本江户时期汉方医寺岛良安编纂的大型插图百科全书，成书年代约在十八世纪初。全书共一百五卷八十一册，以“天地人”三才为分类体系，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动植物、人物、医药等各个领域，试图囊括中日两国的全部知识。《和汉三才图会》的编纂深受中国明代王圻、王思义父子所著《三才图会》的影响，但并非简单仿制，而是在体例、内容选取、图像使用、编排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编与创新。

在已有研究中，学界对《和汉三才图会》的整体结构^[1]、植物与动物部分的编纂依据^[2]（尤其对《本草纲目》的依赖）已有较多讨论。然而，对于地理与人物等《本草纲目》未涉及门类的编纂渊源及其方法，尚缺乏系统考察。特别是在地理部分，《和汉三才图会》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日本江户时期百科事典中对岭南志书所引状况的研究”（项目编号：GD21YWW0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共建课题“《和汉三才图会》中的中华地理·广东出典研究”（项目编号：2023GZGJ269）。

作者简介：杨亚丽，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中日交流史。

虽然以《三才图会》为蓝本，但在篇幅分配、内容编排及参考文献的选取上，呈现出显著差异。

本文以《和汉三才图会》中有关广东的记载为中心，采用文本对比与文献溯源的方法，细致分析其文本来源、编纂方式与知识转译机制。通过与《三才图会》《登坛必究》《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等文献的比对，揭示寺岛良安在地理编纂中所展现出的资料取舍逻辑、跨文献整合策略与本土化改造实践，进而探讨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地理知识接受与重构的文化模式。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和汉三才图会》地理编纂特色的理解，也有助于揭示中日文献交流中知识迁移与重构的复杂过程。

一、《和汉三才图会》中华地理部的总体编纂特色

《和汉三才图会》地理部的编纂，整体上沿袭了《三才图会》的分类体系，但在具体内容与结构上，展现出鲜明的差异与创新。尤其在中华地理部分，寺岛良安并未简单继承《三才图会》的体例，而是根据日本本土的知识需求与阅读习惯，进行了有意识的删裁与改编。

首先，从篇幅分配来看，《三才图会》中关于中国地理的记述细致丰富，占据了十六卷，系统地介绍了各省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物产特产，并附有大量插图^[1]。而《和汉三才图会》则将中华十五省的记载压缩至两卷（卷六十二与卷六十三），内容极为简略，仅列出各省的府州县名称、地理方位与简要沿革，并辅以少量人物事迹与物产记载。

其次，在资料处理方法上，寺岛良安采取了“数据本土化”的策略。《和汉三才图会》中各府州县之间的里程数据，并非直接引自中国原本，而是依据明代军事地理著作《登坛必究》的记载，并以日本本土的度量单位进行换算，将日本道记的单位缩减为原中国里程的十分之一，以便于日本读者的理解。这种尺度转换的做法，有效消解了中日度量制度的差异，提高了地理信息的可读性与实用性，体现出寺岛良安在知识转译上的高度自觉。

再次，在内容组织方式上，《和汉三才图会》不仅保留了各省基本的地理信息，还创新性地增补了地方人物传记。以广东省为例，除列出辖下十府外，尚特意附录了何仙姑、张九龄、陈楠、韩愈、葛长庚等地方名人的事迹。这种将地理与人物有机结合的编纂方式，既丰富了知识层次，也使得地理叙述更具人文气息。

二、《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的文献来源考辨

《和汉三才图会》地理卷中的广东部分，内容包括总述、府州县沿革、地方人物、物产四个方面。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寺岛良安在资料选取与编纂过程中，并非单纯依赖《三才图会》，而是广泛参考了《登坛必究》《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等多种文献，并在转述过程中进行了取舍、整合与本土化处理。

（一）广东总述的出典

《和汉三才图会》在广东总述部分，对广东地理位置、气候特征、民俗风貌、人口规模、对外交通等内容作了简要叙述。经对比可知，这部分内容与西川如见所编《华夷通商考》^[1]（1695

年）及其增补本《增补华夷通商考》^[2]（1708年）高度一致。

例如，《和汉三才图会》中关于广东是“古百越地”“夏至日道在顶上而无影”“暖国冬亦少霜雪”“丝绸、药材极为繁多”，以及“津凑十二处，通市日本”等记载，均可在《华夷通商考》《增补华夷通商考》中找到相应表述，甚至词句结构亦颇为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和汉三才图会》在引用这些内容时，并未明示具体出典，仅以“△按”的形式加以说明，仿佛是作者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这种处理方式，反映出江户时期百科全书式文献编纂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资料来源的隐匿与再加工，将他者知识自然融入己方叙述体系之中，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自主生成、实则高度依赖摘录的知识生产模式。

结合《和汉三才图会》的成书时间与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的出版时间来看，寺岛良安很可能在编纂过程中参照了这两部著作。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寺岛良安与西川如见处于同一知识圈层，皆受益于某一尚未考证的共通文献来源，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考察。

（二）广东十府沿革记载的出典

《和汉三才图会》在广东省下列广州、韶州、南雄、惠州、潮州、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共十府。《和汉三才图会》卷62所载条目“府州县”的接语中交代：

△按，每一省各分作图，以誌其方角里程（摠『登壇必究』），凡中華一里則用六町、其六里當倭今之一里矣、然『海東諸國記』云、日本一里准我國十里（昔日本用五十町為一里、而用六尺五寸為一間、則大略不遠）、蓋以南京北京相間三千四百四十五里、而謂三十日路、則大抵當倭三百四十里、今悉改日本道記里程、取十分之一用之、使人易見耳^[3]。

由上可知，寺岛良安是依据《登壇必究》的记载，将中国各省标注方位与里程，且参考了《海東諸國記》的记述，为便于直观理解，将日本的里程统一缩减为原数据的十分之一。

例如，广州府条目中关于“东至惠州府博罗县界二十二里，西至肇庆府高要县界二十二里”等方位与里程数据，均与《登壇必究》相对应，只是将原数据按日本度量体系缩小为十分之一。这一做法消解了中日度量差异对读者空间认知的干扰，使日本读者能通过本土尺度直观把握中国地理格局。

此外，寺岛良安对于地方沿革的叙述，例如“隋置番州，唐置广州”等内容，也与《登壇必究》的记载高度一致，表明他在编纂时重视军事地理文献的权威性与实用性。

唯独在廉州府条目中,《和汉三才图会》新增了一则关于“合浦珠变”的传说,此段记载并未见于《登坛必究》,最早出自《后汉书》^[7],而《后汉书》中所载“合浦珠变”的故事又被收录进《太平御览》^[8]等类书中。因此,此处《和汉三才图会》的内容可能直接参考自《后汉书》或者是转引自《太平御览》等类书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三) 广东地方人物的出典

《和汉三才图会》独创性地在地理叙述中嵌入了五位与广东相关的历史人物,即何仙姑、张九龄、陈楠、韩愈与葛长庚。这一编排方式不同于《三才图会》,后者虽设有人物卷,但并未将人物资料与地理条目直接结合。

经考证,寺岛良安在人物资料的取材上,大体依循《三才图会》人物卷,但同时也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筛选与修订。例如,《和汉三才图会》所载韩愈传记,与《三才图会》的内容相似度不高,《和汉三才图会》称其为“河南修武县人”,而非《三才图会》《旧唐书》^[9]《新唐书》所载的“南阳”或“昌黎”。这一记载,与康熙九年(1670年)《河南通志》^[10]中关于韩愈为修武人的说法相符。由此推测,寺岛良安可能参考了明末清初的地方志资料。

这一现象表明,《和汉三才图会》的人物编纂不仅是简单摘录,更体现出资料甄别与地方认同意识的交织,反映出江户时期日本知识人对中华文化内部地域差异的敏锐感知与再解释。

(四) 广东物产记载的出典

详细对照《增补华夷通商考》,可以发现,《和汉三才图会》所列广东物产与《增补华夷通商考》几乎完全一致。这种高度重合,再次印证了寺岛良安在编纂中华地理部分时,参照了日本当时已流传的中国地理知识,尤其是西川如见所整理的通商贸易信息。这一取向反映了江户中后期日本对海外贸易知识的高度兴趣,也契合了百科全书式文献对“实用性”知识的优先采集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寺岛良安在编纂广东地理条目时,并未大规模参考中国传统广东方志(如《广东通志》等),这种文献取舍反映出其对实用性信息(如府州位置、交通路线、海外贸易情况)的高度关注,与传统地方志注重地域详备、沿革考据的编纂取向存在显著差异。寺岛良安的选择,体现了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知识接受过程中,从“大而全”向“实用性、目的性”转化的明显倾向。

三、《和汉三才图会》的编纂策略与知识转译机制分析

寺岛良安在编纂《和汉三才图会》的过程中,展现出高度的资料整合能力与跨文化知识转译意识。广东部分的地理描述,尤其体现出他在文献选择、资料处理与叙事组织方面的深思熟虑。总体来看,其编纂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文献选择的实用主义取向

寺岛良安在选取地理资料时,优先采纳内容简明、数据详实、具有实用性的文献。例如,在各府地理信息的编纂上,他放弃了《三才图会》中冗长的地志性描写,而取材于军事地理著作《登坛必究》。后者以明晰的方位、里程、交通节点记述为主,符合百科全书对快速检索与实际应用的需求。这种选择体现出寺岛良安对军事地理知识高度重视,并将其实用性转化为江户时期日本人理解中国地理的重要参照框架。

(二) 知识本土化处理策略

在资料处理上,寺岛良安有意识地进行度量衡体系的转换。他将《登坛必究》等书中的中国里程数据,按照“日本道记十分之一”等比例进行本土化换算,从而使日本读者能直观地理解地理空间关系。这种“数据本土化”策略,不仅简化了信息接收过程,也体现了江户时期知识转译过程中对实用效果的高度重视。

(三) 知识结构的综合化与叙事创新

《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并未局限于单一的地理描述,而是将地方沿革、地理方位、人物传记、物产特产等不同类别的知识有机整合。在每府地理条目中穿插相关历史人物事迹,在总述与物产部分引入对通商贸易的关注,这种综合式叙事不仅丰富了地理条目的知识层次,也使得信息体系更为立体多元。这种“百科全书化”的编纂思路,体现了江户时期日本对综合知识体系建构的追求。

四、《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的文化意义

《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不仅是中国地理知识在日本传播的一个缩影,更是江户时期知识界如何理解、接受乃至重塑外来知识体系的重要案例。其文化意义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

(一) 中日文献交流中的知识筛选与重组

寺岛良安并未全盘接受中国原有的地理知识体系,而是通过删繁就简、择优取材,筛选出对日本社会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这种有选择地吸收与重组的过程,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知识体系既尊重又批判的态度,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再生产者。

(二) 中华地理观在日本本土语境中的转化

通过度量衡换算、人物叙事嵌入、物产贸易强调等手段,《和汉三才图会》有效地将中华地理观转化为适合日本社会认知需求的知识体系。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体现于内容结构与叙事逻辑中,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再构过程。

(三) 东亚知识圈内部的多向互动

《和汉三才图会》的广东部分,其实是明代中国地理知识、日本汉学者加工整理、西川如见等人修订增补,最终由寺岛良安编纂出版的多重互动结果。它体现出东亚文化圈内知识流动的复杂性,不是单向度的输入输出,而是不断加工、变形、再创作的

动态过程。

因此，研究《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不仅有助于理解江户时期日本对中国地理知识的接受与改造，也为探讨东亚文献交流与跨文化知识转译提供了重要案例。

五、结束语

《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的编纂，并非对中国地理知识的简单照录，而是经过精心选材、本土化处理与综合叙事的再构过

程。寺岛良安在参考《三才图会》《登坛必究》《华夷通商考》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日本度量体系与本土需求，构建了兼具实用性与知识性的广东形象，体现出江户时期日本知识界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吸收与创造性转译。

本文通过文本对读与文献溯源，揭示了《和汉三才图会》广东部分的资料来源、编纂逻辑与文化意义，说明中日文献交流并非单向流通，而是多重互动与动态重组的过程。未来若能拓展至地理部整体编纂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入理解东亚知识体系内部的演变与交流机制。

参考文献

- [1] 拙稿「三才図会」から「和漢三才図会」へ：分類と構成を中心に、「外国語学研究」20、2019年、p66(17)-60(23).
- [2] 拙稿「和漢三才図会」「草草」類の配列：「本草綱目」「草菜」類との比較から、「語学教育研究論叢」36、2019年、p287-304.
- [3] [明]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4] 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京都甘节堂，1695年，早稻田图书馆藏，请求记号ネ01 - 04067.
- [5] 滝本誠一編「日本經濟叢書」卷5、日本經濟叢書刊行会、1914年.P232-234.
- [6] 寺島良安編《和汉三才图会》卷6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请求记号031.2-Te194w-o.
- [7] (宋)范晔撰《后汉书》循吏列传第六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p2473.
- [8] 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p475.
- [9] 《旧唐书》卷160中记载韩愈为昌黎人。《新唐书》卷176中记载韩愈为邓州南阳人.
- [10] (清)贾汉复等修，徐化成续修《河南通志》，1670年，京都大学附属図書館藏 请求记号5-86/カ/1 貴.